

童祥苓

口述历史

童祥苓口述
冯绍霆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祥苓口述历史/童祥苓口述;冯绍霆撰稿.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0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146-9

I. ①童… II. ①童… ②冯… III. ①童祥苓—回忆
录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7936号

责任编辑 王 璇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童祥苓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童祥苓 口述 冯绍霆 撰稿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80 00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46-9/K.195
定 价 46.00 元

编 撰 说 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目 录

编撰说明…… 1

一、比哥哥姐姐小了十几岁…… 1

二、我要唱戏…… 9

三、学戏：小学升中学…… 19

四、迷上余叔岩 拜师马连良…… 26

五、初恋和结婚…… 38

六、进了上海京剧院…… 44

七、一年要演五百场…… 49

八、南云有出典…… 55

九、成了小生…… 61

十、拜周信芳为师…… 67

十一、黄油面包不容易吃…… 75

十二、从少剑波到杨子荣…… 91

十三、树立杨子荣的形象……	100
十四、张春桥说“童家能有几个好人”……	106
十五、《智取威虎山》搬上银幕……	117
十六、过年时锅里只有青菜……	128
十七、“文革”后期演出情况……	137
十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145
十九、唱不唱《智取威虎山》……	151
二十、上海京剧院第一个承包队……	157
二十一、从《甲午海战》说起……	171
二十二、退休之前……	179
二十三、小童餐饮部……	192
二十四、兄弟姐妹又少一人……	204
二十五、美国之行……	209
二十六、和谐温馨的晚年……	225
后 记……	241

一、比哥哥姐姐小了十几岁

我家祖籍江西南昌，祖父童泗泉当过吉林官产处长。外祖父广东南海人，据说入股了双妹牌花露水。两家条件都比较好，供子女上大学不成问题。但是，到了父母那辈就落魄了。父亲童汉侠是个大学生，天津法政学院毕业，早先供职军界、政界。以前家里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和孙中山在一起，很宝贵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找不到了。父亲后来没有固定职业，靠为报纸写稿子赚点稿费贴补家用。那时家庭生计主要靠我母亲陈倩颖。她在娘家的时候也是大小姐。我有一个姥姥，老管母亲叫五小姐，管父亲叫五爷。长大了，我问了母亲，才知道姥姥是丫头收房，母亲是正房出生，所以就叫小姐。母亲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与邓颖超、刘清扬同学，后来在小学教书，有固定收入。

我有四个哥哥姐姐：大哥侠苓、二哥寿苓、四姐芷苓、小姐姐葆苓，我叫她葆姐。为什么我管大姐姐叫四姐呢？因为我们家是大排行，男女一起排下来的。原来还有个三哥，夭折了。

哥哥姐姐们年龄相近，我却比他们小了十多岁。为什么呢？因为葆姐之后，母亲怀过三胎，都打掉了。懂事后，我想知道为什么独独留下了我？娘说，打掉三胎后几年都没有怀孕，没想到四十多岁又怀上了我。和父亲商量来商量去，想到这是最后一胎了，就留个小的吧，所以就有了我。

真是好险啊！如果早几年怀上我，或者父母还认为是个负担，我就到不了人世。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我的人生道路坎坷不平，多灾多难。幸好上天又赋予我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个性，让我携妻带子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

1935年我出生时，家在天津虹桥区的鼎新里。到我记事的时候，家境很贫困。那会儿父亲经常失业。大哥二哥为了帮父亲找工作，常常深夜到街上贴小海报。有一次，他俩上街贴海报，在法租界被抓到巡捕房。父亲赶紧去解释清楚，才放了出来。

为了多挣钱，母亲在慈惠圣功小学兼教多门课程。就这样还不够养家，还得做教馆，下了学到人家去辅导，就像现在的家教。还不止一家教馆，有好几家。旧社会教书是很清苦的，她赶来赶去舍不得花钱乘车，一直是步行，走出了许多鸡眼。小时候，我经常看娘用热水泡脚，拿薄刀片修长满了鸡眼的双脚，不修就疼得走不了路。我站在边上看着，生怕娘割伤了自己。娘也看出我的心思，总是安慰我。我年纪虽然小，但她的劳累辛苦早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记得当年景象。母亲六七十岁了，还拿个刀片划鸡眼。我说你找个修脚师傅不好么。她不答应，都是自己削。那会儿家里挺有钱的，完全有条件，但是她还是自己来。我很揪心，感觉母亲很苦，她的脚都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才弄成这样的。娘是天下最好的母亲。

哥哥姐姐都很孝顺懂事。大哥读书时总是捡同学扔掉的铅笔头，用竹管接起来用。当时有奖学金，只给前几名学生。为了得到奖学金，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二哥上学时，学校规定要穿校服，家里给做了一套。他知道来之不易，穿上校服就小心翼翼，不敢弄脏弄破。一回到家，马上脱了叠平放好，第二天再穿。有时因为交不上书杂费被老师训斥，为了不让娘着急难过，二哥总是将委屈忍在心里，娘往往要等接到学校的最后通知才知道。

听四姐说，母亲教书去了，两个姐姐就看护我。后来家有钱了，家里吃饭的时候四姐说起我小时候的事：“现在条件好了。那时候我抱着你，走到马路上看到人家小孩在吃糖，你就吵也想吃。我没办法，就把手捅到你嘴里，说给你吃糖，给你吃糖。鞋破了，脚趾头露出来了，你还在耍，老是动动脚趾，真顽皮啊。”我从小就和两个姐姐亲，老跟在后面，以她们马首是瞻。

所以我跟姐姐的感情特别好，因为从小就是她们抱着我，哄着我长大的。

四姐非常顾家。1939年，海河发大水，天津淹没在水中一个半月，市区绝大多数街道水深一二米。我家也被淹了，一家人困在二楼。四姐把门板拆了下来当船，用演戏用的船桨划出去为家里弄吃的。三岁多的我要学姐姐样，弄了个书桌抽屉翻过来，放在水中漂了出去，三下两下就翻了。幸亏四姐看见一只小脚在水里挣扎，跳进水里捞了起来，我才死里逃生，否则“童家班”里就少了个小弟弟了。

童家踏进梨园界，是从二哥、四姐开始的，根子却在父亲身上。他思想很开明，在读大学时就演过文明戏《黑奴吁天录》里的黑人。那还在清朝末年，父亲为了演这个戏还把辫子绞了。祖父气得要命，给他好一顿骂。别看父亲一句京剧不会唱，但是他喜欢文艺，性格活跃，结交了许多戏班里的人。哥哥姐姐从小耳濡目染，也都喜欢上了京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会儿家里条件不好，哥哥姐姐都大了，懂得家境贫困，看到母亲很艰难。那时候，特别是女孩子，特别懂得维护家里，想着什么办法能够早一点帮助家里改善生活。后来想来想去，姐姐决定去唱戏，她自己也生性爱戏，就入了这一行。

起先二哥、四姐都进了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这所戏校，最初校长是戏剧大师焦菊隐。它与旧式科班不同，边教戏边上文化课。父母不放心让四姐一个人独闯江湖，实际上是让二哥来保护妹妹的。后来二哥受不了在戏校受的苦，母亲只得把他们接回来，在家里学戏。家里生计艰难，要靠典当东西才能付教戏老师的费用。实在凑不出钱的时候，只能停一阵子。二哥、四姐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学戏。他们除了自己练功背戏，还到戏院里看人家演出，从中学艺，行话就叫偷戏。没钱买票，四姐就爬窗子进戏院看。有一次为了看荀慧生先生的戏，又爬窗子，被戏院的人发现，赶了出来。

后来通过江西同乡会领到一些津贴，母亲办了个很小的小学，家中生活略为安定。由朋友介绍帮忙，二哥拜了姜妙香先生为师，四姐拜了荀慧生为师，开始在京剧界走南闯北。起初大剧院进不了，因为他们是无名之

辈啊，就去跑野台子，到农村、庙会去演。后来二哥跟我说，你们现在唱戏舒服了，我们那时候是自己背着包袱，带上所有的行头、替换衣服，往返几十里路都是步行。演完了赶回来，你姐姐还要做饭。

四姐人聪明，肯钻研，天赋好，渐渐有了点名气，外地戏院也来邀请演出。1937年到南京演出时，正赶上日本侵略军轰炸，全家就往南昌逃难。在九江等船时，码头上逃难的人拥挤不堪。船一到，大家都往上挤。当时我两岁不到，二哥抱着我，怕我挤坏，用头顶着前面的人，总算一家人都上了船。船上又没有地方坐，就这样站着到了南昌。那里是我们的故乡，借宿在祖居万花洲南家桥的门房。

为了生计，二哥、四姐也在南昌演出。一天晚上，两个伤兵突然闯进来骚扰，硬说四姐是他们的妹妹。二哥上去阻拦，挨了打，四姐赶紧跳窗户逃走。幸亏有人叫来宪兵，赶走了伤兵，全家当夜就悄悄逃出南昌。

旧社会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四姐成名之后，官僚、地痞、流氓，对她不怀好意的多了。二哥本来不想学戏，旧社会我姐姐一个人东闯西闯不方便，父母让他学戏，好跟着，为的是保护四姐。在上海演出时，小报上还胡写，说童芷苓是童家的童养媳。二哥赶紧同劳月英结婚，为的就是辟谣。

1940年左右，也就是天津发大水以后，我们家搬到了北京，当时叫北平。起初住在宣武门外校场二条，租了三间房。父亲本来就没有固定工作，母亲这时也不教书了，专心扶持四姐在京剧方面发展。这里是全国绝大部分名角居住和演出之地，年轻演员要想有些成就，必须在此地历练一番。由于四姐的拼搏，她总算唱红了，赚了不少钱。我家就买了西四兵马司附近山门胡同里的一所大宅院。

这房子很洋式，那时候开心得不得了。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己家买的房，我激动得心怦怦直跳。走进两扇朱红油漆大门，就看见一片青草地中间长着两棵像大伞一样的柳树，树后面是一排三间八米多高带走廊的西式大厅。大厅里装饰着五彩玻璃，中间还挂着一顶漂亮的大吊灯。穿过大厅，又是一个四合庭院，海棠树、芙蓉树、丁香树、桃树、枣树，把这所大宅院打

扮得十分雅致。我跑啊，跳啊，张开双臂一边快速旋转，一边大声呼喊——我们家有自己的大房子喽！

以前我在宣武门外春明小学读一年级，1942年搬家后就得转学。离山门胡同最近的，条件比较好的小学有两个：它们都在西四二龙路上，一个是觉生，一个是弘达，家里让我两个都报了名，哪个考得好，就进哪个。我们弟兄读书都不错，我考得也不错，觉生考第一名，弘达考第二。但是没让我上觉生，去了弘达。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不进考第一名的。后来才知道，觉生是日本人办的，绝大多数是日本孩子，母亲说情愿去上弘达。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给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只给我们豆饼和混合面。所谓混合面是豆皮、花生皮做的。蒸出来的馒头是黑的，又苦又难吃，吃完还拉肚子。家里偷偷买到玉米，自己磨点玉米面就算是细粮了。我就这样懂了娘不让我去觉生的道理。

在弘达，我上二年级，最不喜欢上日语。那个日本教员一副凶神恶煞般的面孔叫人讨厌。他布置的作业，我从来不认真完成，考试也大多不及格。他问我作业为什么做不好，我也不回答。他就一拳打得我撞在门上，很痛。我不愿意在他面前掉眼泪，他更生气，叫我脸朝墙罚站一堂课。我憋了一肚子气，放学路过辟才胡同，遇上日本小孩就跟他们打架。虽然受了伤，衣服也撕破了，回家还被娘教训了一顿。不过出了口恶气，还是感到痛快。

家里我最小，父亲和哥哥姐姐对我特别疼爱。大概这个缘故，娘对我要求更严格，放学回家，必须把功课做完才能玩。有次我贪玩，马马虎虎做完功课就跑了出去。等回到家，娘不许我吃饭，让我先检查一遍功课，果然出了很多错。娘跟我说，读书是为了我自己，不是读给别人看。长此下去，长大了就会养成做事不认真和不诚实的坏习惯。在我重做了之后，娘才许我吃晚饭。从此，我做完功课都自己检查一遍。这习惯影响了我一生。我当演员后，一次和葆姐演《坐宫》唱错了词。我后来就用娘教的方法，每次演出前都默一遍戏。我与我夫人同台几十年，每次合演，临开演前总要对

一遍词。这习惯一直保持到我俩离开舞台为止。

母亲生我的时候四十多岁了，不舍得小儿子也去吃苦，一定要让我读书，而且让我要学动力学，将来造汽车、造飞机。母亲搞教育的，也是大家闺秀，希望我将来还是走读书这条路，她有这个观念，希望小儿子能够恢复书香门第。

我记得四姐那时候住在南屋，那个屋里就跟颐和园昆明湖边上的走廊似的，雕梁画栋。我们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屋子，一个板床，一张桌子，两凳子，一书桌。有的时候想，姐姐怎么吃得那么好，我母亲说你能跟她比么，你想吃得那么好，你去跟她学，去奋斗。

那会儿北方冬天烧炉子，烧的是硬煤，一买煤就是整吨地置，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砸煤的事情，母亲就让我去做。砸煤也冷啊，而且不小心就把手给震破了。那会儿日本人不允许中国人吃细粮，大家偷着买玉米，家里有个小磨，就磨玉米面，这个活谁来做？也是我。开始想不通，问母亲，有看门的，有保姆，有大师傅，砸煤的事情为什么非得我去？母亲说：“你能一辈子老过这生活么？”

吃饭的时候我不能剩一个饭粒，刚剩个一两粒，母亲就来了，给我讲粒粒皆辛苦的故事。她是教师嘛。说从前有个少爷，家里有钱，经常糟蹋东西，饭总是倒掉。后来落魄了，要饭到一个庙里，老和尚老是周济他，给他吃饭。他说，老和尚待我挺好，天天给我吃的。老和尚说，不是我给你吃的，你天天从狗洞里倒出来的，我都晒干了给你留起来了。这是我母亲的观念，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能保证一辈子不遭难，都过好日子么？

那时候我姐姐疼我，出去跑码头演出，回来时就给我买礼物，有小西装小皮鞋。但是不能穿，收起来，过年穿一次。我结婚以前都是这样。在春明念书的时候就是小大褂，那会儿小孩上学都是小大褂。到了弘达穿校服，跟现在的学生装一样，立领的。面料都是布的，那会儿讲究一点的就是阴丹士林布和卡其布。解放前我跟姐姐到上海时就穿卡其布了。穿大褂，里面白褂子，外面穿件蓝颜色的褂子，学戏和练功也方便。但是母亲给我做

衣服只做两套，轮流换，破了就补，实在不像样了才换新的。当时，角儿都得穿大褂，戴个小礼帽，还有个大小衣，就是这个扮相。现在我都八十岁了，还有个习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都是小时候比较艰苦的环境下养成的。

我和姐姐能够从“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艰难中挺过来，也和母亲的教育分不开。我对高消费不能理解。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家，我们不能糟蹋。母亲给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不能暴殄天物。现在，包括我儿子都做不到了。我对儿子的要求就是：第一，不要打着我的旗号，你就是一普通人；第二，爱国，凭着良心做事。这个传统就是我母亲教育传下来的。后来我们一家人开个小店，在马路边洗碗我都干，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一个人靠双手劳动不丢人，去坑蒙拐骗才丢人，这是我母亲的教育。

搬到山门胡同，还有些现在想起来很有趣的事。小时候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上房。我们家中央大厅屋顶上前面是一个坡，后面一半是平的，还有个栏杆，很高。我老从枣树上爬上房顶，去干嘛呢？我就站在房顶上，拿把刀挥来挥去，把房顶当军舰，自诩舰长了。站在房顶上，我会拿小石子打树上的小鸟，自比胜似作战。常常把石子扔到邻家院子里了，听到人家一叫骂，就赶快逃下来。

我还喜欢恶作剧。表姐到北平读书住在我家。她很活泼像个男孩，就是怕虫子。我弄了好几个油葫芦，晚上偷偷放进她被窝里。掀开被子，油葫芦蹦了出来，她就一边尖叫一边满屋子逃。

在胡同里，我是个孩子头，净跟人打架。家长带着打破脸的孩子来告状，父亲除了跟人家道歉，还得赔医药费，气得不准我出去。佣人奉命看住了大门，我就上房跳墙出去。

我太调皮了，家里管不住，大哥就送我到香山慈幼院住读。那又是日本人管理的，当着家长的面挺好，家长一走就凶相毕露，家里给我带去的点心都被他们吞没了。每天不给我们吃饱，还要干活受训。到了晚上，我从墙边的铁扶梯爬上屋顶，孤孤单单一个人，遥望着家的方向，无限思念。后

来娘来看我，看到一张消瘦的脸，马上抱着我说：“娘带你回家。”她领我走的时候，小朋友都望着我，他们大概也希望有这么一天。

我到现在还喜欢养小动物，就是从山门胡同开始的。几年前，家里养的那只狗死了，我跟发神经一样，老伴赶紧又给我买了一只。我离不开动物，喜欢动物，那有我小时候的记忆。

山门胡同离白塔寺很近，那儿有农贸市场，没事我就往那溜达。那儿有各种鸡，今儿买只黑的，明儿买只白的。我还养兔子、鸽子，养猫、养狗，弄得家里跟动物园差不多。有时候睡到半夜起来抓野猫。弄点干饭拌着，拿着绳子做个圈套，一有猫来吃就逮一个，一晚上能逮四五个猫。抓住了就在屋里养着，床上也有，床下也有，我就搂着猫睡觉。野猫晚上还打架，我父亲还以为闹贼了，门一开，这猫满屋子乱窜，把我父亲气得！

我也养狗，各种各样的狗。记得一次四姐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戏，我给她伴戏，演一个小孩。天津有一个百货公司，叫劝业场。父亲带我去戏院，走着走着走到那，父亲说：“你怎么不走了？”我说：“你得给我买个狗。”我记得有种意大利小狗，大耳朵小尾巴，很好玩。就缠着父亲给我买：“不给我买狗也行，得给我买兔子。”父亲说：“现在上剧场，你怎么要买狗？”我说：“那不行，你不给我买我就不去了。”父亲没办法，就上公司里面给我买了个小兔子。我抱着兔子，就上后台伴戏去了。

父亲爱种花草。山门胡同那宅子里两个院子，海棠树、枣树、梨树、苹果树都种满了。另外他爱种老玉米、西红柿、丝瓜什么的。他喜欢吃。北京有时候一下雨就很大，老玉米全倒了，半夜里我就和父亲戴个草帽去把玉米扶起来，还拿根棍绑着。院子里有棵很大的枣树。秋天长了一树的枣。我还是小孩嘛，没等长红就等不及了。一个一个摘不行啊，树上有毛毛虫，所以得用棍子打，一打就噼里啪啦的往地上掉。父亲刚进院子，砸了个劈头盖脸，对着我一阵吼。我小时候真顽皮。

没几年，我们又搬家了，从山门胡同搬到西四的大栅栏，那里的房子更大。但是我哭啊，我舍不得山门胡同！

二、我要唱戏

我实在爱唱戏。在弘达上三年级时，哥哥姐姐天天练功吊嗓子，我也上瘾了。看他们学戏，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念中学的葆姐也学戏了，教她文戏的是李凌峰先生，昆曲是韩世昌先生。韩先生每天都在下午来，放学做完功课能赶上韩先生教昆曲，我就在旁边听，听得入神，也跟着大声唱了起来。葆姐说我捣乱，赶我出来。我不服气，明明我在一本正经地唱啊！怎么成捣乱了？

不让我旁听，干脆就自己扮戏唱戏：不会勾脸，就把水彩颜料在脸上乱画一气；没有盔头，用做手工的纸糊一个，往头上一套就唱起来。

娘看见了，训斥我。我忍不住顶嘴：“我要唱戏！”

娘不肯。我问：“为什么哥哥姐姐都能唱戏，我不行？”

娘说，过去家里贫困，上不起学，为了养家糊口哥哥姐姐才唱戏。现在家境好了，我就应该读书。这比唱戏强。但我这个不孝子实在难以改变唱戏的心愿。

其实，我五岁就登过台。1940年，四姐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娘把我也带到上海，一家子住在八仙桥附近一幢叫老公馆的二楼。每天演出，我都跟着上戏院。一到那里，我就往后台跑。服装、盔头、刀枪把子，不管什么都东摸摸西看看。开戏前，就到舞台上跑一圈。只有这样我才满足，一种在人生最向往的地方过把瘾的满足。最兴奋的是四姐演《锁麟囊》，我客串小孩。虽然只有两三句台词，我认认真真从早背到晚，台上没有出过差错，所以常常受到表扬。

舞台都敢上，演个小节目更不在话下。四姐和大哥、二哥喜欢跳舞，戏

演完了经常带我去舞厅玩。那时舞厅里还有周璇、白光等电影明星唱歌，小舞台上洋乐队伴奏，我一边听一边哼。四姐问我敢不敢上去唱，那当然敢。大哥真的摆了个凳子，抱我上去站着，唱了一首《蔷薇处处开》。热烈的掌声真叫人开心，四姐还说挺搭调，有胆子，我心里美滋滋的。

在上海，二哥经常带我去看戏。两场戏印象特别深，因为客满，二哥认识中国大戏院的人，就跑到放映间，趴那小窗户里头看。一场是在中国大戏院看马连良先生的《苏武牧羊》，倍儿好，给马先生配戏的有袁世海、叶盛兰、马富禄、张君秋，阵容强大。马先生就是这样，他找的配角都是一流的。那是我第一次看马先生的戏。说良心话，小时候爱看戏但是不懂戏，但是他那个戏抓人啊。那时候马先生红啊，嗓子也好，不像现在唱马派的。现在我跟学生说，你们得学马先生早期的，不能学马先生晚期。当时的印象就是这个人不得了，好角儿，这个印象就形成了。一场是金少山、裘盛戎两位先生合演的《白良关》。三位先生在我心中都是神一般的人物。

不知不觉我成了戏迷。皇后大戏院经常有上海戏校学生演出，很好看。一次我偷偷跑去看《汉明妃》。那些番兵身上绑着马头马尾跳起马舞，最让我着迷。回家路上，我幻想着哪一天也像他们一样，当一个京剧演员。还沉醉在美梦之中，一进家门就被娘劈头打了一掌。她怒气冲冲骂我大胆，说是再敢私自看戏，就永远不许我看戏。我不想失去看戏的机会，一声也不敢吭。

回到北平上学读书，但是有戏一定要看，哪怕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我也不管。有一次头天晚上看了李万春先生的《武松》，脑子里尽是武松杀西门庆，在狮子楼开打的场面，不由自主拿起扫床的帚把舞弄了一番。这还不够，还没有体会到杀西门庆时武松的感受，于是又拿起水果刀跑到院子乱舞起来。心里头一兴奋。见院内停了两辆自行车，就一步上前唰唰几刀，两辆车的前后胎都被割破，才扬长而去。当晚，父亲对我大发雷霆，骂我淘气没边，一次竟割破四条内外胎。臭骂一顿之后，还不准我吃饭。回味起当武松的英雄气概，受罚挨一顿，也算值得。难受的是，这以后家里没带我

看过戏。

最后我怎么走上唱戏这条路的？那是一场大乱子的结果。

那时家在山门胡同，离西单商场不远。西单商场有唱京韵大鼓，也有小戏班日夜演出京剧，类似天桥，或者说像上海的大世界，但是没有楼。父母经常随四姐到外地演出，大哥在北平土木工程学校读书，就由他照管我。他也是戏迷，经常在家里唱，有时也去西单商场听京韵大鼓。我实在憋死了，磨着他带我去听大鼓。大哥实在没法就带上了我。这一来就不可收拾了。

我家后门有个过道，两边墙年久剥落，可以爬着上房。我腿脚灵活，几下就能爬上去。于是，每天上学时，我背着书包出门，嗖嗖爬墙上房，把书包放在房顶上，天天跑去看戏，等到吃饭的时候再把书包拿回来。下午再去看戏，然后在放学的时候回家。大哥在读大学，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家里就是奶奶和我。她觉得我上学出去了，下学就回来了，不知道我去看戏。后来学校来通知了，说我没上学，奶奶说不对啊，天天去啊。还是大哥查出来了，告诉了娘。我逃学对母亲来说是个打击，接到大哥的信赶了回来，狠狠打了我一顿，说你怎么逃学啊。我一边哭一边嚷，“打死我也不去上学，我要唱戏！”

母亲没法说服我，说这孩子不让他学戏，将来不定闹出什么事情来。她放弃让我读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大哥童侠苓，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到北平又读土木工程。母亲说大儿子两个大学学完都唱戏了，何况这小子。现在回想，当时她是下了很大决心，思想斗争了很久。家里经过商量，终于让我学戏了。这让我乐得发狂，抱着娘说，她是最好的娘，我很对不起娘，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学戏，唱出样子来。就这样我进入梨园界，开始入行了。

1943年家里同意我学戏，商量为我改名字。我原来叫福苓，听起来既不响亮，又同“不灵”相近。全家开了圆桌会议，我坐在旁边等待结果。一番研究之后，采纳了大哥的建议——童祥苓。

我学老生行当，因为两个姐姐唱旦角，二哥唱小生，就缺老生。以前母亲总说，假使三哥在的话，他就会唱老生。我顶了上来，当然得学老生。